

# 朱光潛如何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副研究員

熊自健

中共政權成立後，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六年間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與學習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國大陸著名的知識分子如馮友蘭、賀麟、朱光潛等人經歷學習與改造後成爲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爲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注入新血，添加了深厚的人道氣息，深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帶領中國馬克思主義走入新的里程。本文不擬全面探討這場思想改造與學習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過程、意義及其影響，僅就朱光潛個案加以評析，說明朱光潛何以會接受馬克思主義，怎樣做自我批判與思想改造，完成改造後又如何開拓其學術工作，再創高峰。

## 一、唯心主義的困境及其通往馬克思主義的關鍵

朱光潛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前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文藝理論家、美學家與心理學家，先後在吳淞中學、春暉中學、立達學園、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任教。他的著作「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九二九）、「變態心理學派別」（一九三〇）、「談美」（一九三二）、「變態心理學」（一九三三）

、「文藝心理學」（一九三六）、「我與文學及其他」（一九四三）、「談修養」（一九四六）、「談文學」（一九四六）、「詩論」（一九四八）、「克羅齊哲學述評」（一九四八）都是風行一時，影響頗大的讀物。此外朱光潛還譯註了「克羅齊美學原理」（一九四七），開創翻譯西方美學經典之風。筆者在此不能全面論述朱光潛在中共政權成立前的思想與活動，只論述唯心主義者朱光潛的困境，指出其往後通向馬克思的關鍵之處。

### （一）提倡人性全面發展的教育理想

朱光潛一直堅守教育崗位，倡導德、智、體、羣、美五育並重的教育方針；並針對時蔽，引導苦悶的中國青年建立健全的人生觀來迎接中國混亂與動盪的局面。朱光潛在北洋軍閥混戰的時代曾與匡互生、章錫琛、豐子愷、夏丏尊、周爲羣、葉聖陶、胡愈之、周子同、陳之佛、劉大白、夏衍在上海成立達學會，開辦立達學園來實踐他們的教育理想，並發行刊物、設立書店引導中國青年步入正途。「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光潛以親切的口吻說出他和立達學會的關懷與憂慮：



至少有一半時間過真正的團體生活，做團體的活動。學校對於可分工合作的工作應盡量分配給學生們去合作，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問題的商討，實驗的配置，遺誤的檢舉，都必須羣策羣力。一個人如果常有團體合作的訓練，在學問上可以免偏陋，在性情上也可以免孤僻；他會有很濃厚而愉快的羣的意識，他會深切地感覺到：能盡量發揮羣的力量，才能盡量發揮個人的力量。有幾種課程特別宜於團體合作，最顯著的是音樂，其次是運動。這兩種課程應在各級學校中普遍設立。每種課程都可以用討論的方式去學習，每種實際問題都可以在辯論會中解決。一個理想的學校必須充滿著歡喜討論的空氣。在歐美各著名的大學裏，師生們大部份工夫都費於學術討論會與辯論會，在這中間他們成就他們的學業，養成他們的政治習慣，在學校裏是一個辯論家，出學校就是一個良好的議員或社會領袖。我們的一般學生以遇事沉默為美德，遇公眾集會不肯表示意見，到公眾有決定時，又不肯服從，這是一個必須醫治的毛病。此外，學校還必須設有健全的團體組織，學生們才有多參加團體活動的機會，才能養成熱心公益的習慣。一般學校當局常怕學生團結，以致滋擾生事，所以對於團體組織與活動常設法阻止，以為這就可以息事寧人，也有些學校在名義上各種團體具備，而實際上沒有一個團體是健全的組織。多數學生為錯誤的教育理想所誤，祇管理頭死讀書，認為參加團體活動是浪費時光，甚至是多惹是非，對一切團體活動遂袖手坐觀。於是所謂團體便為少數人所操縱，假借團體名義，作種種並非公意所贊同的活動。政治上許多強姦民意假公濟私的惡習慣就由此養成。學校裏學生自治會應該是一種雛形的民主政府，每個份子都應有參議表決的權利，同時也都應有不棄權的責任。凡關於學生全體利益的事應由學生們自己商討處理，如起居飲食清潔衛生公共秩序公眾娛樂諸項都無須教員包辦。自治會須有它的法律，

有它的風紀，有它的社會制裁力。比如說，有一位同學盜用公物，侮謾師友或是考試舞弊，通常的辦法是由學校記過懲處，但是理想的辦法是由自治會公審公判。學生團體中須有公是非，而這種公是非應有獎勵或制裁的力量。民主國家所託命的守法精神必須如此養成（註3）。

在體育方面，朱光潛指出中國體育最落後，久已降到不議不論之列。學校雖設有體育這門功課，大半是奉行公事，體育教員一向被輕視，學生不注意體育可不致影響升級和畢業，學校在體育設備上花的費用在整個預算上往往不及百分之一。體育所以落到這種無足輕重的地位，大半因為一般人根本誤認體膚沒有心靈那麼高貴。然而生命是有機的，身體不健全，心靈就不會健全。身體不健全，不僅聰明智慧不能發展最高度的效能，也影響到性情和人生觀。我們想改變體質，第一步要務是澈底地研究優生，其次則須注意營養適宜，清潔衛生，生活有規律，運動休息得時，以及心境在寬和沖淡，少動氣，少存雜念。康健的生活是正常的自然的，康健的最大秘訣就在使生活是正常的自然的。近代人談體育，多專指運動，其實專就健康而言，運動是體育的下乘節目。然而運動科學地顧到全身肌肉脈絡的有系統的調攝和鍛鍊，又帶有團體娛樂的意味，是羣育的最好工具。要訓練互助合作、尊重紀律的精神，最好的場所是運動場。在中國古代射以觀德；近代西方人也說運動可以養成「公平遊藝」，一個公平正直的人有「運動家的風度」。我們急須提倡運動，不過已往飼養選手替學校爭門面的辦法必須廢除。運動必須由學校推廣到全社會，成為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節目，它才能對全民族的健康有所助益（註4）。

至於說到德育，朱光潛更是針對當時心理的病態開出苦口的良藥，提示自我修養的途徑。朱光潛敏銳地覺察出中國青年的種種病態：從前的青年人病在志氣太大，目前的青年人病在

志氣太小，甚至於無志氣。志氣太大，理想過高，事實迎不上頭來，結果自然是失望煩悶；志氣太小，因循苟且，麻木消沉，結果就必至於墮落（註5）。現代中國青年常感到壓迫、寂寞和空虛。在感覺壓迫、寂寞和空虛中，青年人始而徬徨，身臨難關而找不著出路，躊躇不知所措；繼而頹唐麻木，經不起一再挫折，逐漸失去辨別是非的敏感與向上的意志，隨世俗苟且敷衍，以世故為智慧，視腐濁為人情之常。徬徨猶可抉擇正路，煩悶猶可力求正路，到了頹唐麻木，就勢必至於墮落，無藥可救了。我感覺到現在青年人大半缺乏青年人所應有的朝氣，對一切缺乏真正的興趣和濃厚的熱情。他們的志向大半很小，在學校只求敷衍畢業，以後找一個比較優裕的差缺，姑求飽暖舒適，就混過一生。自然也偶爾遇著少數的例外，但少數例外優秀的青年則勢孤力薄，不能造成一種風氣。現時代的青年，就他們所表現的精神而論，決不能擔當起現時代的艱鉅任務。這是有心人不能不為之憂懼的（註6）。

朱光潛不僅診斷中國青年時下的心病，而且指出中國人的懶是中國社會腐敗的根源；懶，所以苟且因循敷衍，做事不認真；懶，所以貪小便宜，以不正當的方法解決個人的生計；懶，所以隨俗浮沉，一味圓滑，不敢為正義公道奮鬥；懶，所以遇引誘即墮落，個人生活無紀律，社會生活無秩序。知識階級懶，所以學術文化無進展；官吏懶，所以政治不上軌道；一般人都懶，所以整個社會都吊兒郎當暮氣沉沉。懶是百惡之源（註7）。

朱光潛所開出醫治這些心病的藥方是激底的覺悟，立志，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培養惻隱之心與羞惡之心等自我修養、自立自強的奮進精神。朱光潛一再引述儒家、佛教、基督教、他指出：孔孟所謂「仁」，釋氏所謂「慈悲」，耶穌所謂「

愛」，都全從人類固有的一點惻隱之心出發。他們都看出在臨到同類受苦受難的關頭上，一著走錯，全盤皆輸，丟開那一點惻隱之心不去培養，一切道德都無基礎，人類社會無法維持，而人也就要喪失其所以為人的本性。這是人類智慧的一個極平凡而亦極偉大的發現，一切倫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於這點發現。這也就是說，惻隱之心是人類文化的泉源。同時古今偉大人物的生平都能證明真正敢作敢為的人往往是富於同類情感的人。菩薩心腸與英雄骨氣常有連帶關係。最好的例是釋迦。他未嘗無人世空虛之感，但不因此打消救濟人類世界的熱望。「我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何等的悲憫！同時，這是何等的勇氣。孔子是另一個好例。他也明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之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是何等的悲憫！同時，這是何等的勇氣！世間勇於作淑世企圖的人，無論是哲學、宗教家或社會革命家，都有一點極深摯的悲憫心腸在驅遣他們，時時提起他們的勇氣（註8）。

此外其次重要的是朱光潛提出「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此一原則。朱光潛認為在立身處世的任何方面，貪懶取巧都不會有大成就，而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所以能有偉大成就者，大半都靠有極堅強的意志力，肯向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例如孔子，他是當時一個大學者，門徒很多，如果他貪圖個人的舒適，大可以坐在曲阜過他安靜的學者生活。但是他畢生東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陳絕過糧，在匡遇過生命的危險，他那副奔波勞碌棲棲遑遑的樣子頗受當時隱者的嗤笑。他為什麼要這樣呢？就因為他有改革世界的抱負，非達到理想，他不肯甘休。孔子看天下無道，就犧牲一切要拼命去改革它，是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再如耶穌，他的一生都是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他拋棄父母兄弟，反抗當時舊猶太教，攻擊當時的社會組織

，要在慈愛上建築一個理想的天國，受盡種種困難艱苦，到最後犧牲了性命，都不肯放棄他的理想（註9）。

關於如何提昇一個青年人的品德，朱光潛還有許多切弊的見解，在此我們不一一引述。總的說來，朱光潛承持儒學德育的優良傳統，吸收佛教與基督教的精神，運用現代心理學的知識，針對當時中國青年的心病，提出一套自我修養的工夫，把教育的方向從知識販賣扭轉到講求做人的道理上來，親切自然地流露出朱光潛的憂國之情與價值取向，提示一條教育救國救人的途徑。

朱光潛的「全面教育論」在中國當時的教育界並沒有獲得積極的回應，沒有造成朱光潛所期盼的教育改革運動，它只表達出朱光潛個人的理想及其唯心主義的困境。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與中國青年在政治掛帥下熱切尋求走出一條自由民主新中國的道路來救亡圖存，解決苦難，沒有耐心去做教育工作的百年大計。朱光潛所持人性全面發展的人格理想，倒是與馬克思所謂「共產主義新人」方向一致，為朱光潛通往馬克思主義的橋樑。往後，朱光潛在中共政權下轉化以「馬克思共產主義新人」來重新鋪陳其人性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典型。（詳後）。

## （二）「補苴罅漏」唯心主義美學思想

朱光潛的美學思想是以「補苴罅漏」唯心主義美學的方式產生出來的。朱光潛博採唯心主義美學大師眾家之長，以「批判」和「綜合」的方法形成一套美學思想。他的「綜合」以「批判」為前題，而他的「批判」顯示出深厚的學養、敏銳的判斷、與豐盛的美感經驗。他常就某一問題追本尋源，考察問題是如何提出的，歷史上有過那些不同看法，分歧的焦點在那裡，然後證之以審美心理事實和藝術史事實，衡量各家學說之短長。這種批判做得相當謹慎、相當細緻，分歧點也捕捉得相當

準確。在這一基礎上所作的「綜合」，便是截長補短，補苴罅漏地完成一套美學思想。僅以「文藝與道德」這一問題來說朱光潛是如何進行補苴罅漏的工作。

朱光潛指出文藝與道德問題鬧了二千餘年，許多偉大的思想家 and 藝術家都捲入戰團，到今天還沒有得到一個結局。形成「文藝與道德有關」和「為文藝而文藝」兩派衝突的局面。朱光潛先從中國傳統的文藝觀說起，他指出中國民族向來偏重實用，特別注重文藝在道德與政治上的效用。全部中國文學後面都有中國人看重實用和道德的一個偏向做骨子。這是中國文學的短處所在，也是它的長處所在；短處所在，因為它箝制想像，阻礙純文學的盡量發展；長處所在，因為它把文學和現實人生的關係結得非常堅密，所以中國文學比西方文學淺近、平易、親切。西方文藝和西方宗教一樣，想於現世以外求解脫，要造另一個世界來代替現世，所以特重想像虛構。中國文學和中國倫理思想一樣，要在現世以內得解救，要把現世化成理想世界，所以特重情感真摯，實事求是。中國偉大的詩人都是要極簡樸極真誠地把他們的憂生憂世憂民的熱情表白出來，絕對沒有想像虛構的排優氣。在中國文學中，道德的嚴肅和藝術的嚴肅並不截分為二事（註10）。

接著朱光潛指出西方從古希臘到十九世紀，文藝寓道德的教訓是其文藝思想中一個主潮。朱光潛簡要地論述柏拉圖、賀拉斯、基督教、但丁、密爾敦、古典主義，以及盧梭所形成從道德觀點討論文藝的傳統，並指出此傳到了十九世紀受到浪漫主義以及形式派美學的與起而動搖。浪漫主義提倡「為文藝而文藝」，強調藝術的獨立自主，輕理智而重情感和想像，對從前淺狹的道德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形式派美學則從美感經驗的分析證明藝術和道德是兩種不同的活動，給從前文藝必寓道德教訓說以更大的打擊。朱光潛一方面引述從浪漫主義到自然



源豐富，所以意蘊深廣，能引起多數人發生共鳴。「爲文藝而文藝」的倡和者把藝術和人生的關係斬斷，專在形式上做工夫，結果不免流於空虛、纖巧（註14）。

經過這一番檢查，朱光潛重新釐清文藝與道德的關係，從美感經驗中、美感經驗前、美感經驗後三方面來看文藝與道德的關係，提出自成一家之言的理論來：

一、在美感經驗中，無論是創造或欣賞，心理活動都是單純的直覺，心中猛然見到一個完整幽美的意象，霎時間忘却此外尚有天地，對於它不作名理的判斷，道德問題自然不能闖入。西門慶引誘潘金蓮原是不道德的行爲，武松拒絕潘金蓮的引誘原是道德的行爲，但在「水滸」和「金瓶梅」的作者和讀者看，這兩面文章同樣地有趣，同樣地入情人理，武松、西門慶和潘金蓮在藝術上都是成功的角色。藝術作品是否成功，就要看它能否使人無暇取道德的態度，而專把它當作純意象看，覺得它有趣和入情人理。就美感經本身說，我們贊成形式派美學的結論，否認美感與道德有關係。

二、在美感經驗前文藝與道德關係密切。一個藝術家在突然得到靈感，見到一個意象以前，往往經過長久的預備。在這長久的預備期中，他在做學問，過實際生活，觀察人情世故，思量道德、宗教、政治、文藝種種問題。這些活動都不是形相的直覺，但在無形中指導他的直覺所走的方向。一頃刻的美感經驗往往有幾千萬年的遺傳性和作者的道德觀及其畢生經驗學問做背景。有些作家無意於表現道德觀而道德觀自見，莎士比亞和陶潛可以爲證；也有些作家很坦白地自認有意表現道德觀而亦無傷於文藝，托爾斯泰和蕭伯納可以爲證。而就讀者而言，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和見解往往可以影響他對於文藝的趣味。如果一件作品引起道德上的反感，如「李爾王」對於約翰生；或是引起道德上的同情，如看戲者憤恨秦檜，替岳飛抱不平；

美感經驗就根本不能成立了。因此，藝術與道德的距離須配得恰好好處，這是對美感經驗成立的條件。

三、在美感經驗後，文藝與道德的問題更爲複雜。我們一方面要顧到價值的標準，一方面要顧到文藝所產生的道德影響。有些文藝作品可以完全從文藝本身定價值，爲一種歡欣的想像的經驗，如陶潛的「桃花源記」、王維的寫景詩等。也有些作品不能完全從文藝本身定價值的，如屈原的「離騷」，杜甫陸游的詩等，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原來有意地或無意地滲透一種人生態度或道德信仰到作品裡去，我們批評它的價值時，就不能不兼顧到那種人生態度或道德信仰的價值。至於說藝術能發生道德的影響，連形式派美學也不否認。就個人說藝術是無所爲而爲的自由活動，是人性中最原始、最普遍、最自然的需要，文藝是解放情感的工具，是維持心理健康的一種良劑；都具有道德上的價值。就社會說藝術在傳染情感，打破人與人的界限。藝術家的情感較真摯，感覺較銳敏，觀察較深刻，想像較豐富，能見到比較廣大的世界，能引導一般人到較廣大的世界裡去觀賞，啓發人生自然的奧秘。這種藝術的啓發能伸展同情，擴充想像，增加對人情物理深廣真確的認識，構成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礎。沒有其他東西比文藝能給我們更深廣的人生觀照和瞭解，能幫助我們建設更完善的道德基礎（註15）。

由「文藝與道德」的解說，我們可以看出朱光潛的「補苴罅漏」實際上是在中西藝術及至中西文化之間，在各種對立的藝術流派和藝術理論之間，求同存異，折中調和。朱光潛的「補苴罅漏」有時能作出啓人深思的新見，如他參照中國傳統美學物我交融的思想，綜合立普斯與谷魯斯兩派「移情」理論，提出「移情是物我交感共鳴」的新解說，以及上述「藝術無外在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響」的論斷，都是發前人所未發的精闢見解；但是當朱光潛剖析有關於美感經驗個體性與藝術活動社會

